

本刊主编：刘晓立
版式统筹：万修远
联系电话：0311-88643113
投稿邮箱：liuxiaoli0119@163.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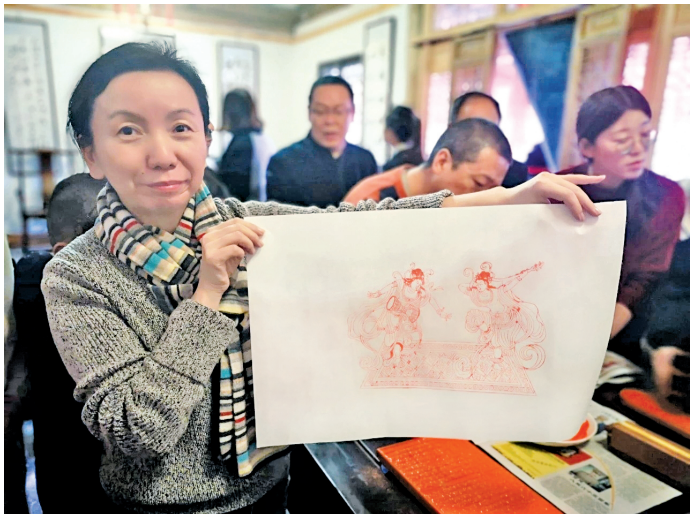
古籍保护

专刊

藏书报
2019年3月11日
总第56期

藏书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联合主办

“走近四库全书”新春启帷 首场活动在甘肃举办



本报讯（记者刘晓立 通讯员王沛）作为新春全国古籍保护工作的首场推广宣传活动，“走近四库全书”系列活动于2月底陆续走进甘肃省图书馆、张掖市图书馆，以及兰州大学、

西北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等高校图书馆。此次活动由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和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甘肃省图书馆（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及省内各单位共同承

办，包括专题展览、书叶抄写、传拓体验、有奖问答、专题讲座等多项内容，旨在让更多的人走近《四库全书》这部体现盛世华光的宏章巨制，进一步了解古籍保护事业，更好地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月26日活动率先在甘肃省图书馆拉开序幕。来自各个学校的小读者对“四库”书叶抄写体验兴味盎然，现场读者对古籍修复传统技艺也饶有兴趣，竞相体验。读者们通过自己动手学习、亲身体验，更直观地感受传统技艺之美，领悟古籍保护的重要意义。

随后，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作了以《谈谈“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为题的专场学术报告，从“四大专藏”谈起，深入浅出地讲述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相关知识。当日下午，领导

专家、特邀嘉宾、媒体代表、读者代表等统一乘车前往九州台现场参观了文溯阁《四库全书》，亲睹瑰宝的真容，并召开了座谈研讨会，广大专家学者就古籍保护和文化遗产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交流。

2月27日，张掖站活动紧随其后。现场，伴随着优美的乐曲和“四库”讲解，张掖市图书馆馆员身着中国传统服饰，手持《四库全书》影印本和“四库”文献，为嘉宾和市民读者奉上了一场精美的“四库展演”。在图书馆大厅两侧，展板展示了《四库全书》编纂风云及存世流传情况，由图书馆馆员挥毫书写的文津阁、文溯阁等阁联也同时展出，广大市民群众从更加多元的角度进一步了解《四库全书》和书法、楹联等中国传统文化。在张掖市图书馆馆长黄岳年的带领下，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甘肃省图书馆、张掖市文化和旅游局等嘉宾和市民读者们共同参观了馆藏四库文献、古籍保护中心、丝绸之路文献中心和潘竟万文献陈列室等。

随后，大家来到张掖市甘州区图书馆分馆南华书院国学诵读中心。这里同步举办《走近四库全书》主题展览、《四库全书》彩色图版展、书画展览、2019年年俗文化展，广大市民在古朴典雅的书院体验传统刷版、抄写“四库”书叶、观看有关《四库全书》的中华经典影视展播，跃跃欲试，兴致盎然。

据悉，本次“走近四库全书”（张掖站）活动还将走进古城分馆助力乡村振兴，并在张掖市图书馆举办有关《四库全书》有奖互动问答，答对者将获得精美的《四库全书》文创产品。

西藏古籍普查工作取得新进展

本报讯 近日，西藏已完成罗布林卡管理处四个收藏点（宫殿）584函古籍的普查登记工作，包括达旦明久颇章352函，格桑颇章20函，金色颇章122函，格桑德基颇章90函。完成620函可移动文物普查登记工作。其中，古籍普查和可移动文物登记两项任务并序进行，确保了两项数据的准确性和唯一性。在普查工作中，罗布林卡古籍普查组完成了编目分类、拍摄书影、级别鉴定、书名翻译等繁杂的普查程序。同时开展了配备装具、纠正错叶、全文扫描等保护古籍、留存档案辅助性工作。

此次普查还有不少新发现。截至目前，罗布林卡古籍普查组共发现保存完好的孤本9函；发现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缮造的蓝靛纸多宝汁《甘珠尔》写本55函及当时试造的蓝靛纸样纸，书写字样稿、多宝汁颜色效果试样稿等相关附属文物；发现宗喀巴大师力著《菩提道次第广论》早期贡嘎版；发现阿里贡唐早期刻本、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御经蓝靛金汁精校版豪华装帧《般若八千颂》、罗布林卡《古籍目录》部分稿本及正本，以及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之后缮造的《准增颇章藏经楼目录》等珍贵古籍文献。

据悉，下一步，普查组将对准增颇章和夏丹拉康4000余函古籍开展全面普查登记，为全面掌握罗布林卡古籍收藏结构、藏量和妥善保存古籍奠定扎实的基础，并计划在“十三五”期间完成全区重点收藏单位的普查工作，实现西藏古籍普查工作基本完成。（晓立）

新时代民间古籍收藏之



· 声音 ·

□河北 赵俊杰

民间藏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对中华民族文脉的延续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尤其是不少大藏书家，将藏品捐入国家公藏机构，拳拳爱国之心令人赞叹。

新时代的古籍藏书家，虽收藏专项各有不同，藏品数量与质量也有差异，但不可否认，各地民间藏书已蔚然成风。古籍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也属于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古代文献典藏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不管是图书馆还是藏书家都有责任保护、研究，并开发与利用好这些古籍文献。怎奈不少私人藏家虽有心却无力，面临诸多困惑与难题，亟待社会的认识与解决。

藏品的修缮难题

民间古籍因流通和交换的频繁，品相多有问题，霉化虫蛀、散页少字等都极为常见，急需进行修复。以当前大多数民间古籍修复机构的定价看（定价标准很复杂，本文以一般破损级别、价值普通、以页论价的情况算），基本上在修复

一页5-7元，高手古籍修复师的价格还要贵一点，每页可高达20元。以一部书100页计算，全部修复完成大约需要500-2000元。这对于多数古籍收藏者来说，费用不低，个人很难吃得消。长期以来，不但会影响藏家的收藏积极性，一些品相较差的古籍也会因缺乏收藏者的妥善保护，而面临更大的损害。

我有个建议，相关政府部门、协会等设立民间古籍保护修缮捐助基金，让全社会的人参与到保护古籍中来。借助社会力量，哪怕每人捐助1元钱，都能为保护祖宗遗留下来的书籍尽一份力，同时能提高公众对古籍保护的认识，不失为一件一举两得的事情。

还可在每个省市设立1-2个古籍修复师，为民间修复机构及广大藏书爱好者进行正规的系统培训，为大家普及科学的古籍保存、保护常识。

藏书科学保存难题

新时代生存空间成本高，民间

古籍收藏大多是在住宅中辟出一块区域进行藏书，藏书条件不佳，一般也不会进行特殊的保存保管。同时，有较多藏书的人，往往因为书籍的存放无序而不易查找，合理利用更是很难做到。

由此，是否可设立专门的藏书存放渠道，便于交流与研究；也可仿照公藏单位古籍普查的模式，对民间藏书进行普查登记、出版目录，这样不仅能帮助藏家进行藏品梳理，也能助力文献的流传有绪。

藏书交流平台难题

新时代藏书家，大多收藏与研究并举，不少人都选择著书立说，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不过民间藏书家，也面临着很多收藏研究的文章无处发表，特别是有的不能以一己之力将其再利用、再出版等，也成为民间古籍收藏保护的难题。

希望国家相关部门能重视民间藏家的这些具体问题，开辟专门的园地，鼓励私人藏书事业的发展，让藏书文脉延续，助力文化传承。

对于古籍修复师汪帆来说，古籍修复不仅仅是一门手艺，更是一个充满了探究趣味的领域。终年坐拥书城，整天手摩指触的都是年代久远的古籍，每天挑选的“佳人”乃是各种各类的古籍修补纸。她不是藏书家，但对纸张的迷恋，以及关山万重寻纸、访纸的亲身经历却也是做不得假的。

她是浙江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师，也是酷爱“寻纸游”的背包客。“修复与纸”是她从事工作以来投入最多坚持与热忱的领域，她说，这里边有不少故事是值得说道说道的。

——开栏语

杨虎楼里的纸库

□浙江 汪小帆

我的工作室依山傍水：凭栏则西湖尽收眼底，推窗则闲听鸟语花喧。左邻是著名的餐馆“楼外楼”，右舍是原清代行宫御花园的中山公园。这两个地方，是众多国内外游客的必到之处。但夹在这两处之间的文化地标“浙江图书馆古籍部”，却鲜有人知。

古籍部的院落内红楼、白楼绿树掩映，空中荡漾着淡淡的樟木香和古旧书味，让人骤然感到此间的生活节奏比墙外的世界慢了几拍，连倘佯在青苔石板路上的野猫，也格外慵懒和大胆，斜睨着经过它旁边的人，尾巴高傲地竖起，似乎被数百年的古书熏陶，它竟也可以用那点子文化底蕴来做人。当然，倘与之对话，谈及此地的原主人杨虎，它肯定只会王顾左右的。

杨虎（1889—1966），字啸天，祖籍安徽宁国。1936 年，身为淞沪警备司令的杨虎耗资七万法币，在西湖孤山之麓开建宫殿式别墅。为免被人议论，对外则称名“博爱堂住宅”。楼成，沿街门楼上却书“青白山居”。唯是主楼侧门有虎头、白羊图像，暗喻杨虎楼。奇怪的是，杨虎竟从未入住此楼。听老同事说：蒋介石来游湖时看到这栋房屋，便问手下：“谁的房子，介漂亮，好像一座宫殿。”听说是杨虎新造的，蒋非常恼怒。杨虎得知后，自然就不敢造次入住了。解放后，杨虎楼收归国有，拨给浙江图书馆作珍藏《四库全书》及善本书的藏书楼。这种年代久远的老房子，尽可供人们放飞想象，幻化出白胡子老爷爷飘在楼梯口等等神奇的传说，老同事喜欢拿来当掌故讲给新同事听，吓得他们不敢独自走楼梯口。今年是我在古籍部的第十九个年头，新人已然变成老人，如今，我也会向新进者“白头宫女话玄宗”的。

但近年来，从杨虎的传奇与白胡子老人的传说中，杨虎楼返回到了现实，成为浙江图书馆新建立的“中央纸库”（专用于收藏古法手工纸）的所在。我参与了纸库的建设的始终，自然与杨虎楼的关系变得格外热络。

所谓的“中央纸库”，只是大伙私下对它的简称，它的正规名字为“浙江省古籍修复材料中央库”。它脱胎于 2011 年建立在红楼的“浙江省古籍修复材料中央库”展示柜。次年，馆藏的古法手工纸全部搬入杨虎楼。2013 年，浙图又派专人到全国各地古法手工纸作坊、工厂调研，获取信息，地毯式地搜集多种古法手工纸，充实纸库。到目前为止，107 平方米的中央纸库内，已经收藏了 207 种、共计 63 万张的古法手工纸。这些藏品按照竹纸、皮纸、封面纸、宣纸等分类存放于六个房间，其中，仅皮纸就有 48 种。中央纸库收藏的，有起源于隋朝的纯皮树纸、比蔡伦纸还早一百年的新疆桑皮纸、距今有 1400 年制作历史的龙游龟纹宣，等等。其他纸张分别来自浙江、安徽、江西、云南、西藏、新疆，几乎现今全国能找到的古法手工纸，悉数网罗入内。可惜的是，有许多种纸，现在已经找不到了，原因就是制作工艺失传或作坊消亡。

品种如此繁多的古法手工纸库，在国内还是首家。入藏琉璃彩绘、斗拱飞檐的宫廷式华阁的纸张，享受着杨虎不曾享受过的待遇，这些纸张可曾记得自己的前生今世，是否会思考手工纸的未来命运呢？当然，他们不会，应该记忆和思考的，乃是制作纸张、使用纸张、保护纸张的人类。

我常想：作为一个古籍修复师，我仅仅当个“慧眼识纸”的使用者就可以心满意足了吗，还是可以为它做更多的事？



杭甬访学记（三）

戊戌年冬月，在江南的初雪中，由沈津先生带队，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硕士、博士 15 人开启了为期三日的访书之旅。经曹鑫老师（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馆员、沈津先生课程助教）的协调，最终确定路线为先至浙江图书馆，再到天一阁，随后至慈溪，拜访家谱收藏家励双杰先生和慈溪地方文献收藏家童银舫先生。

思绥草堂与梦田书屋

□上海 马步青

我们从住处步行穿过一片学校，又通过窄窄的木桥过了河，才走进一座有着三层建筑的农家小院，这，就是思绥草堂的所在。在草堂主人励双杰先生的带领下，大家登上二楼，抬头就看到新夏先生所题“思绥草堂”四字，房内则堆满了各个地区、各种姓氏的家谱。有些家谱还保留了原来的木箱，被高高地放在架子的顶部。

围绕一张小桌坐下，沈津先生向大家讲起了上海图书馆在顾廷龙先生任内收藏家谱的故事。当时顾老特派人到北京琉璃厂去搜寻家谱，凡是上图没有的都尽量购买，或者拿上图的其他副本进行交换。如今上图收藏家谱能有如此规模，与顾老当年的远见是分不开的。励双杰先生也分享了他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收藏家谱的经过。简单介绍后，励先生便从旁边的书架上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家谱给大家欣赏。

首先是一批具有特殊装订方式的家谱。这些家谱相对一般古籍开本较大，其订线有十二眼、十四眼、十七眼不等。其中一种十七眼订线的家谱原有两册，而一册经修复后，被重装成了六眼。据励先生回忆，当时修完一册后，他发现原来极为少见的十七眼线装的装订方式被完全改变了，就停止了第二册的修复，以保留其原有的装订方式。以上各谱虽然书眼数量不等，但其订线方式与传统的“四眼”“六眼”原理基本相同。接下来我们又看到两种完全不按套路的装订方式。一种虽是四眼，但各眼皆单独以较粗的红绳打结而成；另一种则先以“十二眼”装订，再在书脑没有订线的位置上以彩线订出不同的图形，靠上下订出“回字纹”，靠中间订出“万字符”，书脑正中订出“双菱形”，装订如此繁杂确实难得一见。

接下来，励先生又引导我们关注家谱的印刷。我们首先看到一本清光绪年间木活字本《李氏族谱》。谱序言称：“至秋开雕，或言枣梨昂贵，后恕难继板，用串珠取其价廉而工省也。然期年之间，字镌八千，印书成二百部。”其中“串珠”即活字，此段话对该谱使用活字之数量、印成之数记载详明，为研究家谱中刻本与活字本之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之后，励先生并排展示了两种家谱，一为嘉靖元年的苏氏家谱，一为嘉靖三年的王氏家谱。两家谱虽然开本稍有不同，但板框上部皆绘有“二龙戏珠”图案。进一步对比细节后，我们发现这两部家谱之板框应出自同一批或同一块雕版。励先生推测：嘉靖的苏家和王家可能相距不远，他们都在嘉靖初年请了同一位工匠帮助他们制作家谱。这两部家谱是励先生在不同时期所收，从制作上来说算是“亲兄弟”了，四百年后这对“兄弟”竟然在励家相聚，不得不说是一种缘分。而这种缘分，或许只有在励先生多年来对家谱孜孜不倦的搜求中，才能浮出水面，为世人所知吧。

看完印刷，我们转向对家谱内容的关注。励先生拿出一种民国年间的《圳上文联社谱》。该谱不同于一般的家谱或族谱——由一家一姓所修，而是出自十二家异姓共同修订，同载十二家各自之世系。其书前《文联堂重修谱序》云：“文联之成立，始于前清乾隆乙酉曹沂川先生等十二人，沽酒订交，以文会友，置田产，构书院……”，由此可知，此十二家人之先祖自乾隆时订交，至民国仍能接续前谱，重修新谱，殊为可贵。此谱的产生并非以血缘之亲为托，竟能以先祖之谊为继，仿家谱之式，结隔代之好，不知此为一时之风，而或仅有之例？

欣赏过诸多纸质家谱后，励先生饶有兴致地带大家走进里间，向我们展示了数幅图画式的“家谱”——祖宗像。有较小幅的，记录了该族四五代的祖宗；有较大幅的，竟能记至二十几代的祖宗。祖宗像上前几代多画其像，后数代则只画牌位，牌位上记姓名。值得注意的是，有一幅祖宗像的背面右上角题有“道光二十六年 王西五门公纂”几字。由“纂”字可知，虽然形式有所变化，但其作为家谱的实质并没有被忽略，如纸质家谱一般，著者与编纂时间仍被附于其上。这种半图半文的形式，可看作家谱的变体。

离开“四壁皆家谱”的思绥草堂，我们又拜访了童银舫先生的梦田书屋。不同于励先生的乡间小院，童先生的“宝库”隐藏在居民区中的高楼里。三楼的家里，进门即能看到主人的书房，书架由地板直至天花板，客厅亦如是。童夫人悉心准备了热茶与点心，十几个人略显拥挤地围坐一团，听着童先生讲述自己的收藏故事。

童先生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喜欢读诗写诗，当时还与朋友成立了“七叶诗社”。上世纪 80 年代的时候能看到的书很少，去县城买书常常也要半个多小时的路程，因此经常通过邮购的方式买书。刚开始买书的时候没有方向，品类很杂。后来经一位老先生指点，致力于搜购与慈溪有关的书。不论是慈溪人写的书还是写慈溪的书，都不遗余力地收藏。1986 年，慈溪要重修地方志，童先生受邀参与，因此有机会进一步接触和慈溪有关的文人与图籍。在此过程中，他阅读了三百多部相关的古旧方志与家谱。后来，童先生更在单位的支持下，与诸多慈溪籍的文化名人有频繁来往，或虚心求教，或帮其整理文稿，出版著作。如此以来，童先生的收藏便逐渐丰富起来。

在童先生的书柜前，我们看到了有关余秋雨的所有著作。余秋雨为慈溪人。童先生笑称，凡是余秋雨的著作，无论正版盗版他全都收，有些版本余秋雨本人也未曾见过。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了一批慈溪文人的手稿，如洪丕谟的《淑女诗 300 首》，已生出点点黄斑的稿纸，反复圈点修改的笔迹，在如今这个电子化的时代显得十分独特。明明只是二三十年前的事，对我们来说却恍若隔代。在逐渐失去手稿的时代，针对当代的历史研究真的要走向电子数据的搜集与整理吗？想来不禁唏嘘。

三日之行，在我们登上返程的大巴时终结了。三日之中，我们穿梭于图书馆与博物馆，辗转于公藏单位与私人藏家，翻阅着古代藏书与当代文献，赏古书之美，叹藏书之艰。所到之处，皆受到各位老师与学者的热心接待。风雪三日，沈津先生与曹鑫老师不辞辛劳，带领大家游学各处，内心真有万分感激，以此小文谨表谢忱。



《至道堂实纪》稿本修复记（二）

□厦门大学图书馆 张徐芳

2018年10月29日，开工第一天，杜伟生老师不顾长途劳顿，一早来到修复室，与在场的项目组修复人员（陈志梅、张育梅、林敏、李玲敏、张竹悠、傅杰如、陈怡娴、谢华斌）亲切问候。

8:30 准时开工。

按照流程，先拍书影建档，再设计修复方案。根据难易程度，先处理字、再处理画。



集体进行修复试验



林敏



谢华斌、陈志梅

修字方案设计，从揭命纸开始

设计方案从揭命纸开始，逐步完成清洗、补、托、套墩子、上墙等整个流程的试验。

步骤一：揭命纸、确定补纸、装帧。揭命纸是修字画的关键步骤。杜老师强调这次尽量干揭，并亲自示范。在得知命纸的纸样送检情况后，杜老师还建议用揭下的命纸做补纸，因为颜色接近，而且目前找不到比这更好的纸。

操作过程中，不断有新发现：“你们看啊，这东西修过，应该是简单修复，稀浆糊点了四周，只是防止脱落。修复时间大概比民国早一点。”有些纸上有淡红色，推测原件曾用红纸包裹，导致染色，这些都得洗掉。杜老师不停地给大家普及装裱知识。从“看病问诊”到介绍干揭、湿揭、粘揭等揭命纸方法，洗叶芯方法，崩、拔、走、壳、“隔水”“皮”等修复术语，石青、石绿腐蚀纸的原因，机制纸简史，闷纸的注意事项，准备染料，拍摄书影的设备……触手都是学问，话题随其手指动作时而放开、时而收拢。一上午笔走龙蛇，笔记写了满满两页 A4 纸。

杜老师分析原件的装帧，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考虑当地的保管条件，本次修复恢复册页装，做成散叶，便于将来展览。

下午，准备丁香、黄蘗、梔子各半斤，计量称重，配制染液，为染纸作准备。

步骤二：拼碎片，洗叶芯、补叶芯。2018年10月30日，当天主要学习拼碎片，这是修补叶芯的重要一环。

杜老师强调拼碎片的要点是局部喷湿，湿笔推字。喷水容易带动纸，有时改用倒水，这种粗放的做法还是第一次见到。

碎片正面拼接对缝后，用毛巾按压吸水，刷稀浆糊用宣纸固定。反扣后揭除命纸，命纸尽量要揭干净，否则托裱后易“壳”。前一天揭大张命纸用了干揭法，今天这种情况只能用湿揭，横搓竖撕，全凭手感，必要时借助镊子。我们戏称“搓命纸”是给叶芯“搓澡”，上下左右，用力要轻重得当，切忌搓破叶芯。

2018年11月2日，轮到修补叶芯了，杜老师带领大家尝试了传统修补法加手工纸浆修补法相结合的方式。传统修补法用揭下的大张命纸作补纸，手工纸浆修补法用搓下的纸条、碎屑调配纸浆。育梅手工纸浆补书做得最多最熟，在杜老师指导下给大家示范：

先整平叶芯。杜老师介绍用毛巾滚法、毛笔推纸法、双手扒纸法……五花八门。叶芯上白点成片，“这是矾，要用热水洗，一定要洗掉，否则修补时浆糊粘不住”“清洗时不能洗灰了”，育梅配合讲解调整动作，毛笔不停地在纸上划动。杜老师不时穿插介绍纸浆修复的历史、机器纸浆修复与手工纸浆修复的差异、传统文人与装裱工的关系，知识点太多，只能拣紧要的记下。

看到育梅试用手工纸浆修复完成的作品，大家交口称赞。为了更有效率，杜老师还建议手工纸浆修复时可在帘子上铺绢代替纱网，对齐后，可直接在反面滴纸浆，只需翻一次面，简化了工序。

步骤三：托叶芯、做墩子、套墩子。2018年11月7日，杜老师示范托叶芯、做墩子，动作连贯，一气呵成。选开身纸、叶芯留边、托纸留边、搭托、拍浆、游浆、喷水、上墙、吹风机吹干四边等，细节要点一个接一个提示，简明扼要，点到为止。

考虑到将来的保存条件，杜老师决定用夹宣做墩子，这样可以尽量少用浆糊。根据叶芯尺寸，按比例做了超大型四层四夹的墩子。这么厚的墩子上墙后容易崩掉，从中午到下午，大家担心得时不时要照看一下。

次日一早检查墩子，一夜下来还是安然无恙地呆在墙上，心里踏实很多。接下来，杜老师又示范套墩子，从做浆糊开始，用打刷定点洒水、裁边、点稠浆子、扎眼、刺活、挖贴、投活、攒、扒褶子等手法，与前一天一样，要点密集。幸好安排玲敏全程拍摄，可以坐定后慢慢温习。

聚精会神一整天，终于顺利完成了套墩子，上墙！

2018年11月9日，检查前一天上墙的散叶，没有崩的迹象。接下来就是耐心观察，等待干透后套边了。至此，字的修复方案基本完成。

修画方案设计：问题一个接一个

修画与修字工序差不多，但要考虑更多问题：老墨比较稳定，不怕碰水；画有石色，洗画、碰水时间不能太长；旧画一般都上过胶矾，矾是双刃剑，在制造美观、硬挺的同时也会伤纸，时间长了容易脆，所以修画揭命纸一般湿揭，避免画芯碎裂，但杜老师出于保留旧纸的考虑，还是用了干揭法。我们尝试模仿，遵照其提示，干揭了一部分，后来还是改用比较保险的湿揭法。

湿揭法不可避免要用水，大家只能尽量想办法减少画碰水的时间。从修复工序、材料、工具各方面突破，综合运用，效果明显。

这次修画在杜老师的鼓励下借鉴了手工纸浆修书的经验。手工纸浆修书在解决纸源枯竭、大幅度提高修复效率上有明显优势，但是，手工纸浆修复的很多步骤都离不开水。按照邱晓刚老师推广的办法，一般用毛巾、麂皮巾、纸帘层层铺起，再具体操作。杜老师建议帘上铺绢，既透水，又方便提起。修画时也沿用了这一方法，但是在滴浆过程中发现帘子颜色太深，不容易看清楚滴浆情况，大家讨论后定制了白色大纱框，既方便看，又可以很多人围着纱框一起滴，还可以拎起纱框从下往上检查画有没有移位，非常实用。后来为减少滴浆时间，又想出自己抄纸，再用“焊接法”连接画芯和预先抄好的纸，效率再次提高，大大缩短了画芯泡水的时间。通过多次讨论、改进方案，尽可能层层防范，最后出来的效果非常好，画没有移位，石色也保护得非常好。按照华斌以前的做法，这种级别的破损光做口子都得做个一阵子，我们最快的一张仅用了4小时。

这次探索仅针对画芯尺幅较小，而且对装帧要求不是特别高的册页进行，不过还有很多问题留待进一步思考。

如，画芯、叶芯用纸不同，华斌再次选择寄送检测；玲敏、华斌发现前人修复时拼错，杜老师指导复位；喷染不理想，华斌指导大家用拉染法，林敏与玲敏合作拉染，一个牵纸，一个送纸，不时抖动，配合默契，效果较好，最后明胶固色，挂胶。

正式开始修画时，杜老师已返回北京，没他在现场坐镇，大家心里终究没底。华斌担心纸浆修画效果，而且后续步骤不易处理，经过集体讨论，暂时还是选用传统修画法修补。第一张画，由华斌、竹悠上午合作完成拼画，下午托命纸，貌似轻松。华斌说，后面还有很多事情，先隐补，再全色。光做口子就够他扎扎实实忙的，全色接笔也不轻松。从第二张起，我们改用纸浆修补。因为要尽量减少画碰水的时间，必须控制在一天内完成，一般都是上午拼画，中午和下午完成滴纸浆、托命纸等后续工序。为了赶时间，中午加班分批次轮班上阵，有几次下班后继续加班，特别难处理的画甚至延续到晚上九点多。

纸浆补画的方法，华斌时时琢磨，反复修改方案。比如，纸浆滴好后，四边该怎么裁齐。志梅和玲敏奚落他自顾纠结却没留意她们的操作，其实用塑料尺或在边上贴纸条就可以完美解决。大家各抒己见，多次集体斟酌手工纸浆修画的技术难点，重点讨论了保护石色及防止移位问题，经讨论后志梅、华斌试用拉力较好的典具贴做保护，效果满意。周五初定方案后，华斌紧接着列出手工纸浆修画的详细步骤，计划接下来的周一用报纸试验。

整个周末，华斌没嫌着，一直在推敲手工纸浆修画的各种漏洞。周日中午，他特地赶到办公室加班修订方案，甚至列出每一步骤的具体细节及应注意的问题，并交杜老师审阅。当天下午，新方案公布在我们的修复微信群内，大家又一次讨论各环节易出现的问题。为尽可能地减少画芯泡水的时间，华斌特别提出在画芯大面积缺失的地方先用纸浆滴出一张与之大小差不多的“纸”，再用类似“焊接”的办法连接画芯与滴出的“纸”。志梅提出用抄纸代替滴纸，正好我手头有一个做针线活的绣花绷，上面蒙层挤浆糊的纱布就可以抄纸。育梅建议周一带去试一下。大家又一次讨论到深夜。华斌还同时跟杜老师展开微信讨论，兴奋地转发讨论的最新进展。

2018年11月26日，周一。上午，用绣花绷试验抄纸，多次试验后，发现效果不错。大家讨论，还应该继续加强抄纸练习，争取自制更加满意的“手工纸”。同时，需改用方形抄纸框，这样四边直角就可以得到更充分的利用。育梅在淘宝定制了正方形抄纸纱框，大家满心期待。所有成员都踊跃试验。经过比较，玲敏试抄效果最好，抄纸的任务就由她承包了。

抄纸问题解决后，颜色调配又有了问题：本次揭下覆褙纸共有两种，一种偏黄，一种偏红，因事先没作区分，误用后颜色发生偏差。打浆时拟添加封面纸，咨询杜老师、江阴博物馆陈龙老师后，志梅改用华斌旧墨迹代替。

纸帘颜色深，滴浆时不易看清楚破损情况，大家商量定制大纱框代替。用定制纱框修画时，大家围坐四边滴浆，充分利用了人力；滴完浆后可直接托裱，比用纸帘修画少翻一次面，优化了工序，效率大大提高，而且改进后的纸浆颜色特别出彩，大家戏称是“神配色”。

随着修复工作的开展，玲敏的抄纸技术越来越好，成纸匀称，厚度控制得刚刚好。杜老师又指导我们在纸浆中加入适量浆糊，后期处理中揭典具帖时，纸浆基本没被带起，这招又见奇效。

总之，通过多次讨论、改进方案，最后出来的效果非常好，画没有移位，石色也保护得非常好。

中国活字印刷的源流

(一)

□北京 艾俊川

最初的活字印刷，是宋庆历间（1041—1048）毕昇发明的“胶泥活版”印刷技术。宋人沈括《梦溪笔谈》卷第十八对此有详细记载：“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版本。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版。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镕，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贴之，每韵为一贴，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木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镕，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升死，其印为余群从所得，至今保藏。”

木活字印刷的诞生

从沈括的记载可以知道，毕昇在试验活字印刷时，首先选用的是木制活字，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功，这才转而使用胶泥活字。但木头确实是最适合刻字的材料，而且雕版印刷在宋代已经非常发达，拥有熟练的刻字工人、刷印工人，用木活字来制作活版更适应出版业需求。因此在毕昇之后，木活字印刷也被发明出来。

至于到底是何时、何人发明了这项技术，史无记载，但上世纪以来在宁夏、甘肃等地发现了不少西夏文书籍，其中就有一些是木活字版印刷的，如1991年在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发现的《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经鉴定就是木活字本。西夏灭亡于1227年，木活字的发明显然要早于这一年。现存西夏活字本，据史金波先生（西夏学专家）研究，印刷年代有的可早至西夏仁宗时期，相当于南宋绍兴年间。这些活字本中的一些，被认为是泥活字本，但鉴定依据未能令人信服，很有可能是木活字本。那样的话，西夏文木活字印刷产生的时代就更早了。

在元代，根据王桢的记载，他曾在至正二年（1342）创造木活字排印技术，印刷了《旌德县志》。在《造活字印书法》中，他在介绍了当时并不成功的瓦字、锡字排印后，详细说明了自己的创意及实践。他先总括说：“今乃有巧便之法，造版木作印盔，削竹片为行，雕版木为字，用小细锯锯开，各作一字，用小刀四面修之，比试大小高低一同，然后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夹之，盔字既满，用木橐橐之，使坚牢，字皆不动，然后用墨刷印之。”

随后他分别介绍了“写韵刻字法”“鏤字修字法”“作盔嵌字法”“造轮法”“活字版韵轮图”“取字法”“作盔安字刷印法”，这是从制字到排版、再到刷印的贯穿木活字印刷全程的技术原理和操作方法，“活字”和“活字版”概念也就此诞生。《造活字印书法》是中国印刷史上难得的一篇详尽的技术文献，木活字印刷技术至此（1300年前后）已经成熟，并成为传统活字印刷的绝对主流。从此一直到清末，木活字印刷的工艺与王桢介绍的方法基本相同，就是将规格相同的长方体活字

排列起来，再用夹条和板框夹紧，形成版面，涂墨刷纸，而不再使用毕昇那种使用粘结剂的固版工艺。

王桢排印的《旌德县志》也没能流传下来。早期的汉文木活字本，有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一部《御试策》，收录的是元代士子参加御试时写的文章，最晚一次考试是在元统元年（1333）。这部书以前被著录为朝鲜铜活字本，现在根据版面特征判断，应是木活字本；从内容和版式看，如果是在中国出版的，印刷应在元亡之前。但李致忠先生说，他在韩国也看到此书，这样的话，如果是在古代朝鲜出版的，也有可能印于元亡之后。

金属活字的尝试和发展

元代人还尝试使用金属活字印书。在《造活字印书法》中，王桢说：“近世又铸锡作字。以铁条贯之作行，嵌于盔内，界行印书。但上项字样难于使墨，率多印坏，所以不能久行。”虽然当时的锡字印刷不是很成功，却是一项重要的尝试。

明代活字印刷有了长足发展，留下的印本不少，印刷质量也不错。其中有木活字本，也有金属活字本，尤以金属活字本为后世所重。

现存最早的明代金属活字本，是弘治三年（1490）无锡华燧会通馆排印的《会通馆印正宋诸臣奏议》。华燧随后又用活字印了十几种书。华氏家族的其他人如华理、华坚等，也在弘治、正德年间印了一些活字本。这些书的版面特征与常见的木活字本有异，华燧在《容斋随笔》的印书序中说：“今活字铜版，乐天之成”，华坚所印书的版心多题写“活字铜版”四字。华燧同时代人邵宝《容春堂集》后集卷八有《会通君传》，内云华燧“既而为铜字版以继之，曰吾能会而通之矣”，似乎都在说华氏印书使用的是铜活字，故自晚清以来，人们都把华氏所印活字本，看作铜活字本。除了华氏家族印的书，明代还有不少活字本也标榜“活字铜版”，如正德间同为无锡人的安国所印书、嘉靖间芝城所印《墨子》等；还有些活字本则标榜“铜版”。对这些书，早年均径直根据“铜版”二字认定为铜活字本，现在版本界则受新观点的影响，相对谨慎，或著录为金属活字本。

明代的金属活字印刷是中国印刷史上的重要内容，但也存在一些至今未能完全解决的认识难题，如这些活字的材质究竟是铜还是锡，以及明代到底是否使用铜活字等问题，之后可做专题进行讨论。

清代的活字印刷

清代活字印刷比起明代更加发达，由于距今时代较近，留存下来的活字印本也多，还有少量活字实物保存下来，如道光年间的翟金生“泥字”、清晚期的木活字等。清代的活字印刷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朝廷重视，官方应用。清代先后有三次大规模的由朝廷组织的活字印刷工程。先是康熙末年，清内府制作一副铜活字，排印了

《星历考原》《数理精蕴》等几部御制书；至雍正初年，又用这副活字排印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加目录四十卷，分订5020册，总字数达到一亿六千万字，是古代用活字印成的最大规模的一部书；再是乾隆纂修《四库全书》期间，决定出版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罕见书。因为印制《古今图书集成》的铜活字在乾隆初年已被销熔改铸成铜钱和雍和宫的佛像，故采用负责武英殿刻书事务的大臣金简的建议，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雕刻木活字二十五万余枚，陆续印书一百三十四种，两千三百八十九卷，总名为《武英殿聚珍版书》。金简还编纂了《武英殿聚珍版程式》，留下了完整的历史档案和技术资料，也是对传统木活字印刷技术的集大成式总结。最后是光绪十二年，朝廷根据户部的提议，在全国推行民欠征信册制度，规定由各省布政使司用木活字印刷《民欠征信册》。这一全国性的活字印刷工程持续了十年左右。

二是民间普及，深入乡村。清代的木活字印刷得到广泛应用，最早出版的《红楼梦》就是用木活字印刷的。除了印书，清朝人还用活字印刷原始报纸性质的《题奏事件》《京报》等，更印刷了大量一次性、区域性、临时性的民间印刷品，包括需求庞大而单位印量极小的家谱、祠谱等。目前存世的清代木活字本，家谱类占比在90%以上。用活字印刷报纸和家谱，充分说明当时人们对木活字印刷的成本、效率优势有着清晰认识。

三是创新仿古，多方探索。清人对尝试多种材质的活字版抱有兴趣，也仿制成功了毕昇泥活字。在金属活字方面，道光间福建人林春祺费时20年，铸成大小铜活字各20万枚用以印书，称为“福田书海铜活字板”，印刷了顾炎武《音学五书》以及《四书便蒙》等其他数种书。另有广东人邓氏（Tong）在道光咸丰之际铸造锡活字用以印刷彩票，同时开设寿经堂书坊印书，印成《通志》等“三通”及《十六国春秋》《陈同甫集》等书。在泥制活字方面，康熙后期山东人徐志定创制“泰山瓷版”，用模具塑制单个泥字，排成版后入窑烧制成瓷版，印有《蒿庵闲话》和《周易说略》两种书。道光间，泾县人翟金生带领子侄，用十年功夫烧制成大小几副泥（陶）活字，印了《泥版试印初编》《水东翟氏家谱》等书。清代民间这些独出心裁的活字印刷尝试，具有创新精神，但都未能推广，印成品极少，可以用昙花一现来形容。

四是西术东渐，铸以代刻。在19世纪，随着传教士来华传教，西方的铅印技术也传入中国，西方人雕刻铸造了多种型号的汉文铅字，并在中国推广机器铅印技术，最终在20世纪初取得压倒优势，不仅淘汰了传统木活字印刷，也淘汰了使用千年的雕版印刷。铅字和中国传统活字的区别在于，其材质使用铅、锡、锡合金；其印刷使用机器而非手工。台湾学者苏精著有《铸以代刻》一书，对铅字在中国的推广应用有非常详尽的研究。

